

09
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研讨会

论文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五月

序 一

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举办的“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研讨会”，是前几次传达贯彻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精神的继续和总结，是市政协文史工作的新起点。

这次研讨会会有三个目的：

一是进一步明确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编辑整理《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研讨会论文集》，以指导今后文史工作顺利地正常地开展；

二是制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出版计划（第一批）》。这是在3~5年内可以具体操作的中近期征集出版计划；

三是开展联谊活动。文史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关心与支持。

举办“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研讨会”，是因为建国后文史资料在征集内容、对象、方法、步骤等方面与建国前文史资料相比较都有所不同。

在内容上：建国前文史资料侧重于政治与军事史料，而建国后文史资料强调“三加强一开拓”，即：在继续挖掘建国前政治军事史料的同时，加强对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史料的征集；加强对少数民族史料的征集；加强对台港澳及海外史料的征集与交流，开拓建国后史料征集的新领域。

在对象上：建国前文史资料主要由前清、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旧官吏、旧文人，以及起义、投诚、被俘的旧军人撰写，而建国后文史资料主要是经历过建国后历次运动的党政领导同志，知识界、工商界的同志，台港澳爱国人士来撰写。

在方法上：建国前文史资料是“广征博采”，建国后文史资料是“选征精采”。广征博采，打个比方是大面积播种，大面积收获；而选征精采，我的理解是有目的、有重点、有选择地播种，从而获得丰收。建国后文史资料选题，重要的在于选准角度。

在步骤上：建国前文史资料征集的内容一般不存在轻重、缓急、难易的问题，而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紧迫性，并且带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难度，因此在步骤上也有一个难易、先后的问题。

在出版形式上：建国前文史资料出版物以综合性为多，现在随着文化市场的拓展，编辑经验的丰富，专题性、系列性的出版物多了起来。

因此通过研讨活动，进一步弄清建国前史料与建国后史料在征集出版上的不同，进一步明确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文史资料在选题与出版工作中，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选题要有政协与上海的特点，要有史料研究的价值。

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叶选平副主席曾说：“要重视政协工作，重视统战工作，就必须重视做好文史资料工作”。这是从文史工作的重要性来说的。文史资料工作既是政协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必然带有政协的特点。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高举的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因此文史资料的主旋律应是爱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上海的文史资料应有上海的特点。建国后上海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上海是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集中的地方；上海的统战工作在海内外有广泛的联系等等。因此上海的文史资料要有不同于其他省市的特点。

文史资料对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起着巨大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同时，文史资料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还应有“史”的特点，要有历史研究的价值。

二是处理好征集与出版的关系。

征集建国后文史资料是第一位的工作。这个工作搞好了，文史资料工作也就搞活了。否则文史工作成了无米之炊，无源之水。征集建国后文史资料也是基础性的工作，资料征集的面要开阔，正象李瑞环主席说的“要忠于历史的事实，即使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统一也不要紧，可以由后人去研究，去评说”。只有征集到具有一定质量的稿件，才能保证出版物的质量。

有征集才会有出版。作为文史工作者，要把提高文史资料出版物的质量始终放在第一位。过去强调文史工作者要把“三关”，我认为在今天仍然适用。

一是政治关。要以确凿的材料，为历史研究提供文献资料，为对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历史知识教育、国情教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提供有感染力的材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资料。

二是史实关。文史资料作为历史科学，要严格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文史资料的“亲历、亲见、亲闻”特点为历史的真实性提供了条件与保证，但是由于有的作者记忆上的误差及其他种种原因，把道听途说的材料也引入文史资料中来，这种情况也有发生。因此文史工作者要以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做好“去伪存真”的工作，保持史实的真相，剔除不实之说。

三是文字关。现在出版界有一种说法，叫做“无错不成书”。我们文史工作者要在句子的疏通、文字的校订上下功夫，不能粗制滥造。

文史工作是由文史工作者具体操作的，因此文史工作者要在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政协委员，有政协之友社的老同志、老领导，有民主党派、区县政协分管或参与文史工作的同志，有市委党史办、史志办、《工运史》办公

室的同志；有参与文字工作的，有组织录像拍摄的。大家都关心市政协文史资料的工作，对此我表示感谢！

市政协副主席 赵宝玉

（此稿为在“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

序 二

全国政协办公厅在转发《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指出：“加强对文史资料工作的领导，在继续完成建国前史料征集出版的同时，认真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出版工作，努力开创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政协上海市八届四次会议，对文史资料工作也作了部署，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努力征集、选编建国后富有时代特征的崭新的史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为上海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综观文史资料工作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搞好建国后文史资料工作，是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是通过以史鉴今履行政协主要职能的需要，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需要，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也是研究我国近代、现代史的需要。

上海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国际大都市，具有独特的东西方文化特色；上海是工人阶级的摇篮，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我国部分民主党派、许多著名爱国人士的诞生地和长期活动的地方；上海是我国经济、科教、文化中心之一，也是与台、港、澳及海外交流的窗口。上海从晚清戊戌变法，一直到建国以后一幅很长的历史画卷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史资料。新中国成立以来，市有关文史资料工作单位、研究单位和文史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征集出版工作，仅市政协文史委就征集了近5000万字，已出版了91辑，对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情人将越来越少，因此继续征集抢救建国后文史资料显得更为迫切。

这本论文集，收入了部分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部分区县政协、民主党派工作同志，市委、市府党史、文史、地方志办工作同志，人民团体，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等与文史资料工作联系较多的同志撰写的论文共41篇。这些论文对加强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立足点；“三亲”、“三性”的特点；文史、党史、地方志的关系与比较；“广征博采”与“选征精采”；出版与文化市场；音像制作与建国后史料；征集方法等方面。

由于这一论文集编辑时间较紧，难免有不妥之处，请广大读者和文史工作者批评指正。

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

石鸿照

目 录

序一.....	赵定玉 (1)
序二.....	石鸿熙 (4)
北京会议学记.....	李培栋 (1)
文史资料工作的三个立足点.....	王国忠 (5)
关于建国后文史工作具体原则的几点思考.....	连军耀 (9)
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如何体现政协文史资料“三亲”“三性”的特点	杨承祈 (12)
重视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	宗之琥 (16)
对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一点建议.....	孟 波 (17)
应该征集建国后商业史料.....	肖 林 (18)
关于当前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	唐国俊 (19)
探索·建议.....	夏明芳 (23)
抓住主线把握共性 突出特色反映个性 ——对建国后史料征集编纂与研究工作的探索.....	吴祥华 徐 平 (25)
征集编纂建国后文献史料要实、广、精、细.....	吴祥华 郭 炜 (31)
略论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重点.....	张景岳 (35)
对开展建国后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些体会.....	农工党市委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42)
征集和出版建国后文史资料刻不容缓.....	钱乃之 (43)
从记载我曾祖父、祖父的材料,说明征集工作的重要	刘奎龄 (45)
浅谈文史资料的“存真求实”	王 维 (48)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周 雯 (50)
存真求实 留馨百年.....	张光武 (51)
文史资料整理出版必须坚持存真求实.....	章念驰 (56)
希望收一点“表”	冯英子 (62)
一个设想——试办文史资料内部书刊.....	叶 元 (64)
几点意见.....	林 帆 (65)
关于征集出版文史资料的想法.....	任以奇 (66)

7C 7/41

重视和搞好文史资料工作.....	郭天玲 吴绍中 (68)
做好文史资料工作, 为政协工作、为统战工作服务	
.....	长宁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70)
乐为海内外文史作者架起交流之桥.....	虹口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71)
开创文史工作新局面之我见.....	孙铁群 (77)
发挥政协优势 做好文史工作.....	夏世铎 (80)
我学习文史资料的写作和认识.....	孙廷芳 (81)
杂谈文史资料.....	陆泳德 (85)
谈谈党史、地方志、文史三者关系与比较.....	范征夫 (89)
谈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	张生元 (92)
谈谈建国后工运史料的征集研究.....	张金平 (95)
“两个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倪正茂 (101)
拓宽思路, 充分发挥文史资料的宣传效应	李玮颖 (104)
资政和育人——建国后文史资料工作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	
.....	南市区政协文史委员会 (107)
关于征集出版建国后各民主党派史料的若干思考	王海波 (110)
浅论民主党派建国后文史资料之撰写	武重年 (115)
对于征集出版建国后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些浅见	陈穗九 (119)
民主党派和政协合作拍摄文史资料录像片的尝试	明 浩 (121)
文史资料应走向世界	费成康 (124)

北京会议学记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李培栋

一、建国后的文史资料征集与出版工作已是政协文史工作的重点。

其实，建国后的文史资料工作在政协范围之外，早已成为文化界、理论界、读书界和出版界的热点了。大量的这一类畅销书就其性质而言其实就是政协文史工作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比如李锐同志的庐山会议纪实，薄一波同志的回忆录，早已为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社会读者所瞩目。正因为此，更有一些作者瞄准了建国后的主要人物和重要事件，跟踪采访、收集整理，写出一本又一本的广受社会欢迎的出版物，代表人物可推叶永烈。领袖人物的生活、风貌也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因而，李银桥、权延赤的作品具有特殊的意义，使伟大领袖走下神坛，进入民间。至于党史研究室、解放军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各种自传、传记，更是势头兴旺，早已在文化界形成一个“传记热”。

何以故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使这些作品有可能打开禁闭，公开进入社会，自是一个原因。而根本原因则在于建国以后的中国政治、社会的变革太富传奇性了，资料也丰富极了，人们过去所知所闻又太封闭了，渴望了解、渴望寻找自己生活过来的岁月中那些决定过自己命运的各种政策、运动的来龙去脉的需求太强烈了。这该是建国后回忆录、亲历记一类读物的深广的社会基础。

然而，原因还不止此。建国后的中国社会巨变，就人类二十世纪历史而言，其意义比诸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看来更为重大。不惟关心自己的命运的人、关心祖国命运的中国人在关心着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历史，而且所有关心社会主义运动史、关心人类未来命运的人们也都倍加关心中国 1949 年以后的历史演变。也正因此，以中国当代变化为课题作为学位论文题目的海外学子愈来愈多了，海外研究机构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投资和研究领域也愈来愈大了。

因此，去年 11 月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是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确定把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和出版列为工作重点是完全必要的，说这次会议是文史资料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是十分恰当的，这次会议将创造出一个文史资料工作的新的辉煌时期也是人们可以预期的。

上海在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与出版工作方面做得还不够好，尽管在 1989 年北戴

河会议之后，在1993年6月全国政协召开《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编辑协作会议上重申“三加强一开拓”之后，上海在“开拓建国后史料征集的新领域”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大约征集了二百多万字的稿件，但这和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地位是不相适应的，和海内外以及社会各方面对这方面的需求与希望也是远远不能适应的，尤其是和上海本身蕴藏的巨大资料矿藏是极不适应的。

我们上海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者必须认清自己的任务，踏实而积极地把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在建国后的文史资料征集与出版工作方面做出新的成绩。

二、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史料征集出版工作。

政协文史资料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历史学的“史料”，历史学研究工作中最重视史料的原始性，一如司法工作之重视案发现场。原始史料又称第一手资料，一切历史研究工作皆以第一手资料的收集、辨别、排比为基础，由原始史料求得历史真实，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这是一切历史学研究工作的主干工程。第一手资料当然比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所要求的“三亲”为广泛，有文字的，有实物的，诸如日记、信件、器物、遗址莫不皆是，但“三亲”资料作为原始史料的一个组成部分却是弥足珍贵的。因此，在现代的录音、录像技术发达之后，在国外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兴起了“口述史料”的收集热，当事人口述其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保存起来以供历史研究之需，整理出版后化为文字资料，即是回忆录，其真实性固然尚有待比较、排比、考索，但其价值则是可以肯定的，无可取代的。

政协文史资料坚持“三亲”，是必要的，这是政协的优势所在，也是政协文史资料区别于其他党史、国史、方志等工作部门的地方。由政协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即文史资料委员会去组织“三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并且在全国各地普遍发动、普遍开展，把资料积累起来，用为统一战线工作服务，为爱国主义教育服务，为资政服务，为历史研究工作服务，这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有此机构，有此工作，有此成绩，这正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制度中的一环。

因此，政协文史资料不同于党史，不同于共和国史，不同于任何一种正史、通史，也不全是野史，它是原始史料，是“口述历史”，是“三亲”资料，有个人感受，有个人角度，有运动感，有亲切性，有生动性，它不排除个人，它是个人的作品，即使不能保证它的绝对真实性，也决不排除它作为个人回忆资料的可靠性；然而作为出版作品的编选工作而言，则又必须有编选过程中的考证、取舍和编选的目的性，但即使如此，它也只是“史料”，而不是历史学作品。只要略一涉猎上海政协文史资料的《旧上海的帮会》、《旧上海的交易所》等，任何人都立即可以发现它们不同于“上海会党史”、“上海金融史”，但这毫不影响文史资料的价值，相反，你会发现这些“三亲”资料正好可以作为史料使用，并且，只作为政协文史读物去阅读，那也是很引人入胜，很有可读性的，你会觉得更为亲切。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反复强调，政协文史资料作为史料，和历史学所要求于史料的一样，首先就是真实性。史料只有具备真实性才有价值，才能作为史料。所以，对于史料必须甄别，必须考索，必须去伪存真。没有真实性的要求，或者仅仅是放松了真实性的要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便会没有意义，甚至会产生坏的作用。真实性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生命线，我们要求于“三亲”资料提供者的是真实性，我们要求于自己的整理工作的也是真实性，这里来不得半点吹嘘、隐瞒、夸大、歪曲；也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和存心的干扰。李瑞环同志说“一是要忠于历史的事实，即使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统一也不要紧，可以由后人去研究、去评说”，这是极为深刻的指示。这里把史料与史观二者严格区别开来了，史料只能是“忠于历史的事实”，史观即看法、评说，则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这一问题上含糊不得、混淆不得的。

三、排除各种干扰，追求历史的真实。

因此，在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中，一定要追求历史的真实，而为此就要排除各种干扰。

过去多年来，极左思潮的影响是严重的，直至文化大革命中，根本取消政协，取消政协文史资料。极左思潮扭曲了人们对历史的正常看法，把文史资料工作引进极为狭窄的选题、征集和出版的小胡同中去；把大量有价值的文史资料排除在自己任务之外，这已给我们造成严重的祸害。

在思想解放之后，在批判了“左”的影响之后，我们又要注意在文史资料工作中不要发生个人膨胀的偏向，不要发生不是因为政策干扰、而是因为过高估计个人的局部的作用的干扰，这在目前流行的出版物中已经发生了。而现在要征集和出版的建国后的文史资料，则更要防止出现情面因素，推诿过失，回避责任，绕开矛盾等等偏向。

建国后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中更要坚持真实性原则，也许，坚持真实性的原则会更困难。但这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原则的坚定性。先把这方面的困难估计足，不是没有必要的。

四、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强文史资料征集的科技含量。

首先，在征集中使用录音手段，特别是对于抢救对象，对于文字表达困难和健康不良者，应该录音采访，留下原始的口述资料。即使对于已有文字提供者，也可再采访，或组织座谈，用录音手段记录下来以供使用，政协应有非文字资料的储存设备以及编目要求。

更重要的是要采用录像手段。我们已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成果，要更好地发挥这一科技手段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象城市改造、人物专访等方面，录像资料是无可代替的。现代化的城市应有现代化的文史资料储存，根据这些录像资料可以编辑出

艺术性的音像短片来，辐射于社会上，其影响决非文字出版物可望其项背。

因此，我想，我们应该对于录音、录像的要求另列选题计划，另订选题目录，以和文字资料并行开展。

去年11月参加北京会议以后，对于开展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和出版工作多次学习、讨论，有如上几点主要的体会。至如上海市的选题研究以及具体开展的步骤等问题则不在这里赘述了。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文史资料工作的三个立足点

上海文史馆馆长 王国忠

这个题目中的“立足点”，不是说的我们写文章、观察事物的立场观点，而是指做好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的三个基本出发点，并且不包括史料的公开出版在内。在数学上，三个点联成的面是最稳定的，称之为三角形的稳定性。数学上还有一个现象：在一块地里种植作物，以三角形的排列方式种植，植株的数量是最多的。我借用数学上的日常知识，是想谈一点怎样又快又稳妥地开展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

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历史不能割断也割不断。不明白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之前三十年来新中国的历史，就难以理解改革开放的巨大意义。不了解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那段中国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中华大地上那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而不了解文化大革命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后来党和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急剧转变。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离今天已经三十一年，今天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在感觉上已是遥远的历史。难怪一些老干部老同志对十来岁的小孙子小孙女讲述自己怎样被红卫兵揪斗、下跪、坐“喷气式”时，小孙子小孙女们怎么也不理解：“你不会打电话向公安局报告，叫他们来抓这些坏人！”他们无法理解那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即使像我们六、七十岁的过来人，现在看到市场上那么多琳琅满目的日常用品，不但卖不完，而且商店还要搞促销，想起六十年代初连草纸、肥皂、香烟、针头线脑都要凭券凭票购买的情景，心里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所以，建国后文史资料工作的征集，已是很紧迫的事。但是建国后的史料怎么顺利征集，撰写人怎么下笔，怎么出版推向社会，比起建国前的文史资料，既有不同的特点，也有新的难度。新中国成立前的史料，可以说是非曲直黑白分明，阵营界线清楚明朗，落笔比较容易。新中国成立后的成就有目共睹，这些史料容易写，但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这半个世纪的前一半，成就与失误并存，历史的天空时阴时晴，时雨时雾，有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脉络至今未理清，或只露端倪，不知底蕴，加上卷入这些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决策者或健在、或他们的亲属都在，撰写人落笔迟疑，笔底滞重，欲写还休，那是完全可以理解和谅解的。我想，这是建国后史料征集、撰写工作的困难所在。本文题目所说的“三个立足点”，就是想在怎样比较顺利开展征集，撰写建国后文史资料工作的三点很不成熟的意见。

一、立足于存真、求实

文史资料的生命在于真实，记录下撰写人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轨迹。历史是指昨天以前已经过去的事件，不论事件的发生原由，演变过程如何，均已不能改变他的面貌。文史资料的目的就是真实记录下这段历史面貌和这件那件历史事实。记录得越原始或接近原来面貌，就越有史料价值。文史资料，一如建筑房屋用的材料，沙石、砖瓦、钢筋、水泥、玻璃、木材、涂料等等。建筑师运用这些材料可以建成小巧玲珑的小楼，也可用来构筑气势不凡的大厦。历史学家可以运用文史资料来撰写成历史著作，文学家可以用文史资料来铺陈为文学作品。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我所用”，可以用史料来为阐述自己的观点服务，可以用史料来塑造各种人物。他们的“自由度”比较多一些。而文史资料工作者并没有这个“自由度”，不能按照自己的喜怒哀乐来组织或改写史料。这大概就是文史资料工作者与历史学家的区别所在。当然文史资料工作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撰写文史题材的文章，阐述自己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看法，但这已是文史作品，不是文史资料。作品是经过加工的有自己观点的文章，资料应是原来面貌的保存。即使是所谓敏感性的人和事，也应如实撰写，不要回避。存真求实是文史资料的唯一准则。无论是我们文史工作者，也无论是撰写者，都要有一种历史责任感。不让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不让历史因当事人、见证人的作古而成为谜团，这是文史工作者的责任，是对社会、对历史负责的一种命中注定、无法推托的责任感。记录下的史实应该是真实的，应该是本来面貌的再现，不论这个本来面貌是美是丑，是好是坏，是曲是直，是是非非，都要秉笔直书，不应按自己的主观愿望或按某些客观力量的驱动而改变。我们文史资料工作者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出发，要始终不渝地坚守这个准则。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有一首歌，歌词说：“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这是文艺创作，是小说家言，不是历史。电视剧里除和珅的情节与历史上的和珅基本一致外，其余的人物不是移花接木，就是张冠李戴，这种文艺创作手法为电视剧的主题服务，可看性也强。剧本作家和演员可以随意拼接，剪裁和“创作”历史，故事情节可以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人物活动可以一会儿天南，一会儿地北。文史资料没有这个自由。它的准则是存真。文史资料的撰写还要注意求实。朴实无华，不施脂粉，不加装裱，不加修饰。只求叙事清楚，文理通畅，不可添枝加叶，随意剪裁。随意添加水份，或穿插大段评论，都是不适宜的。可读性并不是文史资料的必要属性。至于铺陈为文史故事、人物传记，或写成笔记小品，那当然要求生动、可读。但这已是文史作品，不是资料本身的要求。

二、立足于多角度、多层面

一段时期的历史或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常常如一个多棱镜，从不同角度视察，会有不同的看法，虽说都是当事人或见证人。这不难理解。自然界的现象是客观存

在，一般说容易有统一结论。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轨迹，比较复杂。名人因所处社会地位高低不同，接触某些历史事件的多少不同，立场思想观点不同，都会影响到对史料了解的数量与质量。但即使是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甚至是叱咤风云的决策人，撰写史料时也会有不全面的地方。他可以把事件的原由讲得明明白白，但事件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影响未必清清楚楚。“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是个普遍现象，对自然界的观察如此，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观察更是如此。比如上海解放时期反银元贩子的斗争，反米行老板囤积居奇的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这里决策人、当事人、参与人和普通市民的心境并不完全一样，如果多角度的反映出来，将是极好的有教育意义的史料。又如五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历史事件，决策人未必了解这一事件对被审查定性人的心态、家属因牵连而产生的困境及后果。对当时许多站在旁观地位的人的各色各样的心态就更不会了解。被审查的人虽然处在事件的旋涡之中，但未必了解事件的底蕴。我有一个朋友，当时还很年轻，从未看过胡风的书，更不曾接受过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仅仅因为调到一个出版社当了领导的秘书，领导被定为胡风分子，他也被关了起来，一年后才通知他说弄清楚了，没问题，放了出来。糊里糊涂进监牢，糊里糊涂被放出来，这出“捉放曹”，他如果写文史资料，也只能写自己亲历的一点，写不全面。只有多方面的人来写，才显得丰富。又如大跃进，可以说八亿人都卷了进去，农村里欢天喜地吃大锅饭，城市里敲锣打鼓超英赶美迎接共产主义，结果助长了共产风，浮夸风。在我们的后代看来，这是一出幼稚的闹剧，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撰写成文史资料，不是可为后继的历史学家提供总结历史教训的研究材料吗？一家之言，可能是某一方面的权威史料，当然可贵，但如果另有几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撰写出有关史料，那就更能真实记录下历史的原来面貌。

三、立足于先保存后出版

征集文史资料的工作，主要立足于把史料抢救和保存下来。文史资料，特别是建国后的史料，尤其是四十年以来的史料，涉及到的人、事繁复纷纭，公开出版宜慎重。虽说昨天的事已是历史，已成定局，把发生的重要史实记录下来，免得淡化了，这是对的，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要间隔一段时间才能审视得清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此身在山中”。间隔、离开一段时间来思考这类历史过程，效果更会好一点。撰写文史资料可以趁热打铁，而根据这些史料写史，则须“冷处理”，作冷静的理性分析。所以撰写文史资料宜抓紧时间，但出版要滞后。先保存后出版，比较稳妥。文史资料主要是留给后人用的，正如我们今天的文史期刊、图书用建国前的史料一样。现在组织编写建国后的文史资料，主要是给二十一世纪的后人用。现炒现卖，不是撰写文史资料的方向。期刊上不是刊登了不少反映建国以后乃至文革以后、三中全会以后的文章吗？那是文史作品。多数作品经过改写，有意回避了一

些人和事，免得引起麻烦，影响安定团结。作为保存史实的文史资料我在第一个问题中说过，宜秉笔直书，按历史的本来面貌记录下来，对历史负责。但什么时候公诸于社会，或在什么范围内公开，这与保存是两回事。建国以后的历史贴近现实，涉及面广，涉及人多，要发表不能不郑重考虑以下诸多因素：不要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是非曲直，要以中央有关决定为准；涉外问题，国家机密问题，乃至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宜注意与国家的政策一致；涉及到一些人的隐私，要采取尊重和回避态度，不能追求“读者效应”。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人，要耐得住寂寞，“一副热心肠，十年冷板凳”，是我们这些人的写照。不求闻达于当今，只为有益于后人，是我们的心愿。当然，出版要滞后，不是说不要出版也并不排斥自己写文史性文章，偏文史书籍，何况，建国后大量的建设成就也要收集编辑出版，但我觉得，这已属文史作品，与文史资料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所以就不多说了。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浅薄之言，一孔之见，望在座各位专家、学者指教。

上海是文史资料十分丰富的王国。怎样让这些资源变成文字资料保存下来，我建议制订两套选题。这两套选题是互相关联的。一套是纵向的，就是根据历史阶段制订的选题，这套选题已经有了个讨论稿。还有一套是横向的，就是确定一批重大历史题材，邀请500~1000人来写，这些人都是某一历史事件的决策人、当事人、参与人、知情人。由这些人撰写的文史资料，上海一定能出现一批高质量的史料，为当代史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关于建国后文史工作具体原则的几点思考

南市区政协 连军耀

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总理生前交给人民政协的一项极其光荣的任务，是一项惠及子孙的重要工作，是政协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行之有效的形式之一。1995年11月，全国政协召开了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指出：继续推进文史资料工作，是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是通过以史鉴今履行政协主要职能的需要，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需要，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这次会议还要求全国各级政协“努力征集和选编建国后的文史资料，以富有时代特征的崭新史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但是，如何开展建国以后的文史资料征集、选编和出版工作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基础变了，对象变了，内容的主体要从建国前转向建国后，因此，我们的方针必须随之而变。那么，怎样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杨拯民同志提出了“五个坚持”的原则，即坚持统一战线的特点和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有计划有重点地征集史料；坚持提高文史资料出版物的质量；坚持统筹规划加强协作。无疑，这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必须遵守的准则。然而，在有了这些根本的总的要求以后，具体工作中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方法有哪些？这些问题随之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对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工作的具体原则，我们作了几点思考，供商榷。

一、在内容上坚持反映主流

建国以来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辉煌的篇章，也是经历各种失误和挫折，最终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和各党派团体在解放、接管、对私改造、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辉映千秋的历史经验；但是，也犯下了“文化大革命”之类严重的错误，十年浩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蒙上了抹之不去的阴影。由此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孽债和“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关系，给今天的文史资料工作者带来了困扰和烦恼。杨拯民同志指出：“我们应当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翔实地记述各方面的伟大成就，理智地总结失误的教训。”实际上，这就要求征集、出版建国后史料要大胆地反映历史主流，详

尽地描绘建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光辉历史。

反映主流是以辩证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表现。其一，主流是客观存在；其二，反映主流并非夸大主流；其三，并不排斥反映历史的曲折。文史资料作为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必须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文史资料工作的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只有反映历史发展的主流，才能坚定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决心和信心，才能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否则，政协的文史资料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相反，回避历史，文过饰非，忽视反映曲折的历史是更高层次的实事求是的实质，政协的文史资料将会丧失其生命力。对历史事件如此，对历史人物亦然。由此可见，反映主流就成为文史资料工作者在征集、选编、出版建国后史料时处理史料内容和形式、篇幅和数量关系的重要原则。

二、在方法上坚持“选”字当头

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是建国后的史料研究门类比较多，有国史、党史、地方志、厂史、行业史等等，相互之间还有交叉，政协的文史资料怎样来搞？政协的文史资料应该具备哪些特点？如何发挥政协的优势？

杨拯民同志说：“我认为要有选择地征，而不是普遍地征。”于是，在过去文史资料“广征博采”的基础上，提出一个“选征精采”的概念。何谓“选征精采”？杨拯民同志作了生动的比方：在征集工作上，我们要“选”字当头。就是说不要普遍去搞，不能搞编年史，不能打“阵地战”，要打“游击战”，打“运动战”，这就要加强调查研究，选准题目。要根据主客观情况，制定具体的征集规划，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征集。

第一，“选征精采”要求我们依据政协工作的要求，结合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主要职能，明确工作的计划性，科学地厘定选题，选择那些富有现实意义，为今天的人们所关心的专题，深入挖掘历史的经验教训，为解答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难题提供有益的启示，因题找人，因人选题，有的放矢地开展征集工作。

第二，“选征精采”要求我们强调“三亲”特点。这是政协文史工作三十多年来形成的独特风格和优良传统。“三亲”虽是作者个人的见闻，在表现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其必然的局限性，但更生动、更具体、更真实，况且众多人士关于同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回忆就相得益彰，成为历史记载不可缺少的有效补充。或许有些缺损的个体汇成丰满完整的整体，是我们恪守“三亲”原则的原由之一。

第三，政协的文史资料不能脱离政协的优势。政协的优势就是政协委员、统一战线、知识库、人才库。我们要动员、组织推动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界人士，请他们把建国以来亲历、亲见、亲闻的有历史价值、有教育意义、有借鉴作用的史料提供出来，从一个侧面为研究党史、国史提供素材；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丰富人们的历史知识，提供生动、具体、有